

赵静蓉 著

#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记忆在瞬间生成，  
又绵延久远。  
它使个体的生命片段得以连缀，  
令个体确立起对自我的认知和对集体的认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赵静蓉 著

#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 赵静蓉著.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11  
ISBN 978-7-108-05396-1

I. ①文… II. ①赵… III. ①记忆—文化社会学—研究  
IV. ①B842.3-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32992 号

责任编辑 胡群英

装帧设计 薛宇

责任印制 宋家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http://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铭传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635 毫米 × 965 毫米 1/16 印张 18.5

字 数 238 千字

印 数 0,001-5,000 册

定 价 39.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 目 录

## 导论 / 1

- 一、作为日常生活的记忆 / 1
- 二、关键词梳理:后现代理论、文化记忆、身份认同 / 4
- 三、流动的社会、记忆和身份 / 27

## 第一章 记忆、记忆文本及其与真实性的关联 / 40

- 一、记忆与符号叙事 / 40
- 二、历史的记忆化书写 / 47
- 三、记忆的边界与危机 / 62

## 第二章 记忆的伦理学与情感政治 / 92

- 一、创伤记忆的文化表征 / 92
- 二、中国记忆的伦理学向度 / 111
- 三、政治道德对记忆的规约及其现实路径 / 122

## 第三章 全球化的记忆生产 / 141

- 一、全球化的话语 / 141
- 二、记忆研究的复兴 / 149
- 三、启蒙与创伤:全球化记忆的两种类型 / 168

2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

第四章 作为一种现代症候的认同焦虑 / 181

- 一、归属感的缺失：公域与私域间的区隔 / 181
- 二、“我是谁？”：微观的个体与永恒悬置的身份 / 194
- 三、含糊暧昧的“他者” / 214

第五章 记忆之于身份认同的有效性与合法性：

救贖抑或陷阱？ / 222

- 一、帕慕克的纯真博物馆 / 222
- 二、迷失于挪威的森林 / 241
- 三、生存焦虑与文化安全 / 253

结语 成为“我”：一项永不停止的身份规划和记忆工程 / 268

主要参考文献 / 274

后记 / 291

# 导 论

## 一、作为日常生活的记忆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

在人类对自身的一切认识和反思中，记忆是最深刻也最不可或缺的参照。没有记忆，人就无从知晓“我之为我”的缘由和过程，更无法探究“我之有别于他人”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记忆不仅决定了人类自我的本质，也塑造了人类知识及历史的源头。

然而，记忆不是安然无恙、恒久不变地被置放在某个地方的，记忆也不可能始终保持既有的样子等待着我们去挖掘、去发现。就像歌里所唱到的那样，即使记忆是一朵“永远不凋零的花”，它也要“经过风吹雨打”，经受时间和世事的考验。一个个体的年龄、身体状况、心理现实，他身处身的环境、遭遇到的事情、对未来的设想，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主导的文化意识形态、家国民族的现实诉求、集体的政治认同，等等，任何一个环节的变化都会导致记忆的

建构和重构。所以，记忆也是极其复杂的。

复杂性开启了记忆指向的多种可能性。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记忆成了一种可以被改写和重写，甚至总是被改写和重写的东西。记忆是一个知识生产的过程，也是一种历史书写的结果，更是人类生命的自我持存。记忆在瞬间生成，又绵延久远，它使过去澄明于现在，又将未来置放在现实中考量。它使个体的生命片断得以连缀为一个贯穿始末的历史过程，并因而赋予人对自我的认知和认同；它也使“集体”这个概念及其力量有据可循，并经由共享催生个体对集体的归属和认同。

毋庸置疑，记忆的力量是无比强大的，而在这样一个变化多端、极速发展的时代里，记忆更具有不断开放以及不断生成的特征。在后现代的理论语境中，技术、科学、政治、市场，甚至全球化的产业链和越来越细密的社会分工，无一不深深地渗透到了记忆的生产、传播乃至消费之中。记忆在扩张，或者说在膨胀，甚至有取代历史和传统的势头。而在这一切看似“繁荣”、“喧嚣”的记忆盛景之下，记忆的危机也日趋明显、愈益严重、不容忽视。记忆的真实性、可靠性，甚至清晰度受到普遍质疑，记忆主体的合法性也被动摇。更值得注意的是，记忆的政治功能或其意识形态性越来越被强化，记忆不仅仅不再局限于心理学的范畴，甚而超越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边界，泛化为一个“文化层面”上的概念。由此，记忆摆脱了历史和传统的幽禁，从被认为独属于过去或仅与过去紧密相连的关系中冲将出来，深刻而全面地融汇到了人类的日常生活之中。记忆成了极具现实感的“生活世界”或“生活现象”。

那么，究竟是什么推动或促成了记忆职能和记忆核心的转变？是社会精神的影响，还是现实生活的需求？而这种时时刻刻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记忆，又是否还保持着对过去以及对人类个体的忠诚？记忆的危机是否影响到了人类对自我的自省与认同？人

类的生存感又是否因此而发生动摇?……对记忆的疑问随着对记忆探讨的深入而愈益增多。

我试图以后现代理论的整体风貌为问题语境,以文化记忆的哲学理念和社会学应用为立足点,以身份认同的概念演变为依托,对记忆的范式、身份的构建及其相互关系进行理论建构和文化文本解读,从而尝试剖析并解答这些问题。本书的基本思路是:理论准备(关键词解读)——问题情境(社会心理学根源)——社会塑造(记忆的范式与身份的构建)——实践范畴(文本解读与理论反思)——现实批判(文化批判)。我希望可以超越以往单纯依据记忆主体的构成来讨论记忆问题的思路,重点梳理在现实情境中记忆与身份所面临的种种本体论、价值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具体构架为:首先通过界定关键词来框定全文的理论范围,然后以“流动”为问题情境,从人们对记忆危机的争论入手,从记忆的“真”谈到记忆的“善”,又谈到记忆的“是与非”;后半部分则从“公域”和“私域”的演变切入,以记忆与身份认同之间的正相关及负相关关系为依据,探讨现代人的生存焦虑问题。

我认为,后现代理论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所造成的最大紧张与焦虑,并不是经济与技术发展的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是克服对“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在充满冲突与断裂的多元社会中对自我重新定位,把解决当代人的精神危机与延续传统的努力有效结合起来,通过保持自我发展的历史不被中断、自成一体的自我世界不被分裂,而重获完整感、连续感和统一性的问题。因此,在后现代理论的语境下研究身份认同的问题,不仅必要,而且急需。

而在后现代理论语境中,文化记忆的主要功能就是为身份“定位”:一方面,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并以此重构后人的文化身份;另一方面,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确证拥有集体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向他



们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因此文化记忆既是我们进入认同问题情境的一个极佳切入点，也是我们探讨后现代精神的切身路径。我们期待着通过对后现代理论语境的考察，对身份问题的梳理，对文化记忆谱系及类型的甄别等，把当代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对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史、思想史研究，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研究等提供有益的启迪，通过自我界定、自我批判、自我超越，以尊重、宽容和自主的姿态理解历史、现实和未来，积极参与到世界文化的建设中去，也为研究人类精神史提供另一种视角和可能性。

## 二、关键词梳理：后现代理论、文化记忆、身份认同

### 后现代理论

就像我们对“现代理论”的定义总是犹豫不决一样，我们也无法对“后现代理论”给出一个简洁、准确并且清晰的界定，虽然这并不影响我们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在含有某种共识性的层面上频频使用这个词。我认为，这种学术共识首先和基本地来源于我们对“后现代理论”这个概念所蕴藏的时间暗示的认同。承认这一时间暗示，就意味着承认“后—现代理论”的发生晚于“现代理论”，在时间序列上是“现代理论”的延续和发展。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当前学界对“后现代理论”的主流认识。时间意义上的先后决定了“后现代理论”决非凭空产生，它必然在逻辑关联上也与“现代理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粗略地看，“后”（post）至少可以包含四种指向：第一，衍生、拓展、发扬；第二，反思、修正、改造；第三，破坏、反抗、颠覆；第四，完善、超越、创新。前两种之“后”大致等

同于“在……之后”，后两种之“后”或可对应于“反……”。不论是哪一种关系，“后—现代理论”都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非—现代理论”，二者的内在联系决不能被忽略甚至被否定。

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中对“后现代理论”进行了批判性的探源，他们就认为：

所有的“后”(post)字都是一种序列符号，表明那些事物是处在现代之后并接现代之踵而来。……

一方面，“后”描述一种“不是”现代的东西，它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试图超越现代时期及其理论与文化实践的积极的否定。正因为如此，后现代话语和实践常常被视为反现代的介入。……在这种规范性意义上，前缀词“后”表示同此前东西的一种积极的决裂。……这种决裂既可以从正面将其看成是从旧的束缚与压迫状况下的解放，是对新事物的肯定，向新领域的迈进和对新话语、新观念的培育；或者，也可以从反面将它看成是一种可悲的倒退，是传统价值、确定性和稳定性的丧失，或是对现代性的这些仍有价值的因素的抛弃。

另一方面，后现代一词中的“后”字也表明了对此前之物的一种依赖和连续关系，这种依赖和连续关系使得某些批评者认为后现代只是一种进一步强化了的现代性，是一种超现代性，“现代性的一种新面貌”，或是一种现代性之内的“后现代”发展。<sup>〔1〕</sup>

---

〔1〕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37—38页。

可以这么说，“后—现代理论”这一构词方式体现了自其产生之初至今，这个概念在使用者的理解中所能引发的最基本的分歧。因之而来的，时间的界线及其与“现代理论”的历史关系也成为我们考察这一概念之发展演变的最重要的依据。

换个角度来看。“后现代理论”除了可以被拆解为“后—现代理论”，还可以被分解成“后现代—理论”，后一种构词法显而易见地把“后现代”变成了一个限制语或修饰词，而“理论”则成为这一概念的中心意义。形象一点讲，这一微妙的转换其实是要表达这样一个问题：在“后现代”的时代里，我们如何理解我们所处身的世界、社会、他人和自身？因之我们又如何建构或判断自我及其与所有“他者”的关系？这个问题以及这种构词法揭示出“后现代理论”不仅仅局限于本体论的知识体系，它还是一种认识论，这个概念已经先天地包含或被赋予了使用者的某种判断或意见，已然带有某种意义色彩。

与“后现代”高度相关的“理论”，这本身就是一种理论系统或体系的表达。它意味着“后现代理论”在本质上应当是一个理论群，作为一个类概念，它一定还包括众多与其有逻辑关联的从属性概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理论”也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后现代”的理论范式<sup>[1]</sup>，它不仅要为某个团体提供某种通用的规则，设立约定俗成的标准，还要能够树立模型或范本，搭建一个畅通有效的平台，使这个团体的成员之间以及这个团体与外部世界之间可以实现专业的交流和沟通，它应当具备库恩意义上的“范式”所规定的基本要求。具体到“后现代理论”的实践语境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概念的能指异常丰富，它不仅包括了后现代精神分析

[1] 参见周宪：《文学研究的范式转变：从“固体”到“流体”》，《外国文学研究》，2008年第6期，第137—145页。

学、后现代女性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不同的理论主张，还涵盖了后现代社会理论、后现代文化理论、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伦理学、后现代政治、后现代地理学、后现代生态主义、后现代科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理论发展。这些理论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后现代的社会历史、时代精神、文化经验和话语特征，充分地证明了“后现代理论”的多元性。

然而，“后现代理论”这个概念并没有因为我们在时间序列和逻辑关联上对其进行了基本的甄别而变得更明朗一些，我们对它的理解也并没有因此而更加深入。一方面，从时间角度来看，有学者认为“后现代不能被看作是一个历史分期概念：后现代对我们关于时间的思考提出质疑，对我们以过去思考现在、以现在思考将来、以‘非时间性’（no-time）观点思考现在的思维方式提出质疑”<sup>〔1〕</sup>；并且，“后现代”对历史阶段的界定也更模糊。比如在《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中，作者就提到，众多讨论后现代理论的学者都对这个概念的最早使用及其所包含的精神特征的最早来源持有不同甚至迥异的想法。<sup>〔2〕</sup>另一方面，从逻辑角度来看，“理论”本身就意味着概念、结构和系统，而“后现代理论”作为“批判性的质疑”，恰恰与“理论”概念本身相抵触，那些被贴上“后现代”标签的理论家们更是常常否认这一概念的“同一性”。道格拉斯·凯尔纳和斯蒂文·贝斯特认为：“后现代理论提出了对再现理论和那种认为理论只是对现实的镜像反映的现代信念的批判，转而采取了‘视角主义的’（perspectivist）、‘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理论充其量只是提供了关于对象的局部性观点，并且所有关于世界的认知性再现都

〔1〕 [英]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42页。

〔2〕 详见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6—12页。

受到历史和语言的终结。一些后现代理论因而拒斥那种为现代理论所钟爱的关于社会和历史的总体化的宏观观点 (macroperspectives), 赞成微观理论 (microtheory) 和微观政治 (micropolitics) (Lyotard, 1984a)。后现代理论还拒斥现代理论所预设的社会一致性观念及因果观念, 赞成多样性、多元性、片断性和不确定性。此外, 后现代理论放弃了大多数现代理论所假定的理性的、统一的主体, 赞成被社会和语言非中心化了的 (decentred) 碎裂的主体。”〔1〕安德鲁·本尼特和尼古拉·罗伊尔则指出: “后现代显然欢迎和接受从多元视角对其进行思考, 它抵制‘元语言’ (metalinguage) 的总体化姿态, 抵制将之表述为一套体系化的解释理论的企图。”〔2〕

后现代强调解构和摧毁, 但这种解构和摧毁更确切地表现为一种意欲超越现代的“广泛的情绪”而非机械的理论教条, 我们在宣扬后现代理论的现实批判精神及其朝向未来的乐观态度的同时, 我们也必须承认它与现代社会、现代理论、现代精神之间无法割裂的联系。在《后现代理论: 批判性的质疑》一书中, 作者梳理出英国画家约翰·瓦特金斯·查普曼是较早使用“后现代”一词的艺术家, 早在1870年前后他“就曾提到过‘后现代绘画’一词, 用来指称那些据说比法国印象主义绘画还要现代和前卫的绘画作品”〔3〕。而非常有意思的是, 现代主义艺术产生的标志性事件, 即1856年波德莱尔出版诗集《恶之花》, 1857年福楼拜完成小说《包法利夫人》, 1863年马奈在巴黎沙龙中展出一幅题为《奥林匹亚》的画, 这些事件几乎是与“后现代”一词在文化艺术领域中的最早出现同时发生的。

〔1〕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 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 第5—6页。

〔2〕 [英] 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 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 汪正龙、李永新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242页。

〔3〕 [美] 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 批判性的质疑》, 张志斌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年, 第7页。

这种时间上的一致性更确证了后现代理论脱胎于现代社会母体这一观点。事实上,较此更进一步的观点认为,后现代理论的批判精神和反本质主义等特征与现代性自身的反题——即美国学者卡林内斯库意义上的“审美的现代性”——如出一辙。

波德莱尔曾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对“现代性”做了另一种界定:“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这种现代性公然宣告了现代生活的“过渡、短暂、偶然”的本质,从而推翻了启蒙现代性所一直奉若神明的永恒理性,破碎了理性的胜利带给人类的、对未来战无不胜的幻想,把先前对历史宿命的盲信变成了对现实生活的清醒认识。而与之相似的是,“后现代理论正是将本质作为一个巨型幻觉来祛除的:不存在某种单一起源物,不存在某种确定无疑的同一性和纯洁性,万物没有共同起源,或者说,万物的起源各个有别,它们成千上万,互不关联。在所谓的本质处,站立着的是偶然、机遇、运气和莫名其妙的怪诞。本质不是必然的,不是不言而喻的,它不过是后来者的臆想、幻觉,是别有用心的累积和混淆视听。本质最终是卑微的,是微不足道的”〔2〕。后现代理论自身充满了悖论,讨论后现代的理论家们也歧义纷争,我们唯一能够确定的后现代的总体特征大概正是其“不确定性”,这一理论也因此具有怀疑的本能、批判的勇气和开放的精神。它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是语言学转向所带来的对恒定意义及不变本质的反抗,是对同一、均质的现代精神的否定。而在语言学转向和符号学、话语理论等思想学说的产生和诠释为后现代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现实可能性之前,审美现代

---

〔1〕 [法]波德莱尔:《1846年的沙龙: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郭宏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24页。

〔2〕 汪民安:《后现代性的谱系》,载于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性(或法国学者瓦岱所称的“美学现代性”、德国哲学家威尔默所说的“浪漫的现代性”)已为之奠定了理论内部发展的必然性基础。

尽管如此,尽管我们极力宣扬后现代理论充满批判、否定、解构甚至摧毁一切的精神,但我们仍然赞同和相信后现代理论与现代理论一样,也具有无限的创造力。在解构和摧毁之后,后现代理论并没有因此就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中。美国学者格里芬坚称,他所理解的后现代主义应当是一种建设性的或修正性的后现代主义,“它试图战胜现代世界观,但不是通过消除上述世界观本身存在的可能性,而是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建设性或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一种科学的、道德的、美学的和宗教的、直觉的新体系。它并不反对科学本身,而是反对那种单独允许现代自然科学数据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1〕。所以说,无论是法国学者德勒兹所说的“创造概念”,还是利奥塔所说的“创造机会”,或者是福柯所说的“创造生活”,后现代理论依然是将创造视为思想发展的原动力的。所不同的是,后现代的创造首先和主要地表现为一种宽容和尊重,即对所有可能性的开放,特别是对在现代社会中被视为权威、精英、中心、本质等之对立面的边缘、民众、草根等的包容。就像汪民安在《后现代性的谱系》一文结尾处诗意表达的那样:“后现代性正是这样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以一种反希望的形式构想了希望,以一种反伦理的形式构想了伦理,以一种反上帝的形式构想了天堂。”〔2〕

---

〔1〕 [美] 大卫·雷·格里芬:《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载于大卫·雷·格里芬编著:《后现代精神》,王成兵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36页。

〔2〕 汪民安:《后现代性的谱系》,载于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主编:《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页。

## 文化记忆

两希精神（希伯来精神和希腊精神）是西方文化的奠基性概念，也是整个西方文明的精神根源；而古埃及和古中国也开启了古老东方文明的源头，形成了绵延久远的文化传统。那么，它们是如何发展，又如何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侧重点各不相同的文化形态呢？文化的保持要经历一个怎样的过程？文化的选择和淘洗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文化的变迁是否只是文化自身发展的规律？文化是否会断裂？文化如何保持连续的精神并且不断地沿袭、继承和创新？简而言之，我们在讨论文化之前，该怎样进入这一语境？

进入文化的语境，可以有多种途径。比较常见的大概包括：从时间的维度上看，可以通过探讨制度的变迁和更迭来考察文化形态的转型；从空间的维度上看，可以甄别地域的差异，借助研究由之形成的文化的地方性或区域色彩，来研究文化的民族特色；从人类主体的角度看，还可以研究人类形象与精神的变化和差异，比如酒文化、茶文化、沙龙文化、阶级文化等；从人与世界及时代精神的互动来看，还可以探究宗教、家庭、艺术、军事等，经由“文化的细节”理解“文化的整体”。在上述诸种形式中，我们可以看到，时空维度是文化研究最基本的尺度和坐标，保持和延续文化都要在一定的时间及空间中才能实现，因此，从记忆的角度切入文化，不失为一个非常有效的视角。

记忆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古希腊神话中的提坦神之一摩涅莫辛涅就是最早的“记忆女神”，也是记忆的人格化神。德国埃及学专家扬·阿斯曼在解释“文化记忆”这个概念时，就曾这样说道：“文化记忆就是希腊名字摩涅莫辛涅的翻译。因为摩涅莫辛涅是九位缪斯女神的母亲，所以她的名字也代表了一种整体性，即被不同的缪斯神所人格化了的文化活动的整体性。经由把这些文化活动归为记



忆的人格化，希腊人不仅认为文化基于记忆而形成，并且文化就是记忆的一种形式。”〔1〕在扬·阿斯曼的运用中，“记忆”和“文化”这两个概念被密切地联结在一起，在某种程度上，几乎不分彼此。而事实上，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和全新意义上的名词，“文化记忆”这个概念也确实是由扬·阿斯曼引入到人类学的视野中，并渐渐地进入到社会学、历史学和其他学科领域中的。在1992年一篇题为《文化记忆——人类早期文明的文字、回忆和政治认同》的文章中，扬·阿斯曼提出并解释了他对“文化记忆”的理解。

扬·阿斯曼认为，文化记忆是“人类记忆的外在维度”〔2〕。文化记忆的核心是记忆，它既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过程，即记忆及其传承、保存和延续的过程，又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结果，即被筛选、被揭示、被重新发现和重新建构之后的一个结果。因此，文化记忆首先是对“真的事实”（real facts）的精确回忆，是这些“真的事实”本身。但除此之外，它还是一种解释和证明。用扬·阿斯曼的话来讲，就是说，文化记忆不仅包括“被记住的过去”（past-as-it-is-remembered），还包括“记忆的历史”（mnemohistory）。“被记住的过去”其实就是一种“对过去的证实”（reference to the past），就是通过创造一个共享的过去，再次确证拥有集体身份的社会成员，在时间和空间方面向他们提供一种整体意识和历史意识。而“记忆的历史”就是“记忆文化”（memory culture），是指一个社会借助文化记忆术，通过保存代代相传的集体知识来确证文化的连续性，并且尽可能地把它呈现给后代的人们，以重构他们的文化身份。在“被记住的过去”和“记忆的历史”的共同作用下，文化记忆就成了对久远过去的一种集体理解和集体建构。这就是人类维持其本质代代相传的

〔1〕 Jan Assmann, *Moses the Egyptian: The Memory of Egypt in Western Monothei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5.

〔2〕 参见 <http://tspace.library.utoronto.ca/citd/holtorf/2/0/html>。